



□郭建国

收集党代会首日封是我的爱好。1992年起，每一次的党代会，我都收到过党代表从北京寄来的纪念封。但唯一遗憾的是，也许党代表们会事务繁忙，这些纪念封，或是非首日寄出，或是非人民大会堂寄出。

这枚二十大首日封(图一)，是浦发银行上海闵行支行祝玉婷女士从北京人民大会堂寄给我的，这是她再次当选党代表后，又一次为我寄赠首日封。

这枚由中国集邮有限公司发

党代表寄来首日封

行的首日封，以欢庆为主题，画面右上角并排贴有“奋进新征程”和“建功新时代”两枚二十大纪念邮票，体现了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奋进新征程，创造美好生活的昂扬精神面貌。

两枚邮票正下方位置是个红色的纪念戳，正圆形，上方是铁锤和镰刀组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徽，附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2022.10.16北京”字样，下端姹紫嫣红的花朵则表达了各族人民对党的深厚感情和无限热爱。“北京人民大会堂2022.10.16.20”字样的邮戳紧随其后。该首日封除书有收信人邮编、地址、姓名外，落款为：二十大代表祝玉婷2022.10.16于北京。

与这位党代表认识，要从5年前说起。

2017年10月，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十九大”代表介绍，一位来自金融系统的代表引起了我的注意。如邻家女儿般亲切，这个土生土长的“上海小囡”是位“85后”，曾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我试着通过“顺丰”给她寄了一封快件：希望得到一枚首日实寄封。但时间已非常仓促。

次日刚上班，手机上的新闻显示：上海市出席党的十九大代表今乘坐“复兴号”启程。当天手机上“顺丰快运”的公众号还告诉我，快递已于中午11:33由快递小哥刘某某安全送达。

慢了一步，眼看梦想即将成为泡影。我急中生智，通过快递小哥，顺利得到了祝玉婷的联系方式，怕打扰她开会，我向祝代表发

出求助短信。很快有了回复：等我拿到相关首日封就给您寄送。

果真，两枚十九大首日封(图二)在大会开幕后的第四天，闪亮展现在我面前。但美中不足的是，少了一枚“人民大会堂”的邮戳。

今年祝玉婷再次当选党代表，我第一时间发微信祝贺，还没等我开口，她便爽快承诺继续为我寄首日封。在她开启“二十大时间”之前，我再次打扰她：若能盖上“人民大会堂”邮戳更好。

二十大闭幕，我收到这枚字迹流畅，似乎还飘着“人民大会堂”邮戳墨香的首日封，心中激动万分。再次表示感谢，她回复：开幕式后回住处，在宾馆邮局买了首日封，正准备寄出，当得知没“人民大会堂”邮戳时，一时慌了神，在旁的代表建议下午去大会堂试试……

上海青浦供电公司徐爱蓉代表寄给我的十八大首日封同样感人。

十八大前夕，徐爱蓉不慎骨



图一



图二

折，只能坐着轮椅参会。闭幕后不久，我收到她的来信：实在抱歉，由于腿脚不便，没能在北京给您实寄。今随信给您寄套盖有开幕、闭幕日期的“人民大会堂”邮戳的首日封，不知是否合您心意……

尽管没有实寄，但我的“党代会”专题中，却增添了一件异常珍贵的藏品。

苏州供电公司十八大代表韩克勤寄给我的首日封也让人动容。十八大开幕后第三天，一枚由北京邮票公司发行，贴有“科学发展”和“继往开来”两枚邮票的首日封寄到了我单位，“北京人民大会堂2012.11.08.20”字样的邮戳清晰可见。我随即给这位正在北京开会的党代表发了短信，她的回复更令人惊喜：那天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终于如愿完成任务，很高兴。今天又给您寄出了一枚首日封和一枚小型张，应该算是超额完成任务吧！

那一封封象征着友谊与关怀的首日封(图三)，承载着党代表对一位普通收藏者的支持，这一枚枚看似寻常的首日封，将给予我奋进的力量！



图三

□周小丽

诸“柿”如意

“洲白芦花吐，园红柿叶稀。”在这秋叶飘落的季节里，碧空澄净，最为讨喜的水果当属柿子。

柿树原产中国，在我国约有3000年的栽培史。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上林赋》中记载“枇杷燃柿”。《晋宫阁名》云：“华林园柿六七株，晖章殿前一株。”南北朝时，柿子开始由庭园栽培发展为大面积种植，到唐代“教民种柿”蔚然成风。俗谓柿树有“七绝”：一寿，二多阴，三无鸟巢，四无虫，五霜叶可玩，六嘉实，七落叶肥大。唐人郑虔曾用柿叶练字，终于有所成就，被玄宗赞誉“三绝”。明人张定《在田录》记录，朱元璋曾因饱餐柿子而封它为凌霜侯。柿果丰厚圆硕、形如如意，又因“柿”与“事”“世”谐音，所以用以寓意“事事如意”“万世顺心”。历代文人吟咏柿子，画家绘制柿图，医家配制柿药，匠人制作各种柿形纹饰的用具，这些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柿文化。

清代剔彩柿柿如意纹盘。此盘呈海棠形，共具四瓣，体髹朱漆，底承四瓦足。盘心镌形开光，内外均饰锦地纹。盘内正面海棠形开光饰回字纹与内壁相隔，中饰菱形纹作为锦地，其间



清代剔彩柿柿如意纹盘

□朱刚

赵昭文墓志铭涉及的一段历史

大宋吴越国赵昭文墓志铭，浙江省博物馆藏有拓本。该墓志铭资料收录于《吴越胜览》《五代十国墓志汇编》等书。笔者在查阅该墓志铭文字内容时，发现涉及贍县复称剡县的相关史料，可校正方志缺漏。

该墓志铭题为《大宋吴越国故登仕郎检校尚书屯田员外郎知中吴军榷棹转运务兼回图榷酒等务官赐绯鱼袋赵府君墓志铭(并序)》，高62厘米、宽65厘米。墓志正面刻志文，楷书45行，满行44字，四周线刻卷云纹；崔昌鼎撰志，全文近1800字，记录墓主赵昭文生平甚详。背面刻黄传庆撰迁葬记，楷书19行，满行19字，四周线刻几何纹。

赵昭文，字文昌，历官湖州安吉县尉、长兴县丞、会稽府新昌县令、明州奉化县令、台州黄岩县令、钱唐府桐庐县令、会稽府剡县令等职。北宋开宝四年(971)，卒于苏州任上，春秋五十有一，葬于长洲县武丘乡大来里之原。上推其生年在五代后梁龙德元年(921)。太平兴国三年(978)，夫人朱氏仙逝，遂迁葬同归于钱唐县履泰乡陈垠村武城里之原。墓志称赵氏：“显德二年乙卯岁(955)二月出守会稽府新昌县令……乾德五年丁卯岁(967)十月再守会稽府剡县令。勾践兴王之国，将泰生灵；子默访戴之溪，复资绥抚。”时在吴越国忠懿王钱俶执政时期。

按《嵊县志》(修订本)记载：“五代吴越国时，剡县属越州东府。梁开平二年(908)，吴越王钱鏐析剡县东南13乡置新昌县，剡县改称贍(一作瞻)县，属吴越国东府镇东军。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复称剡县。属江南东道越州；淳化四年(993)属两浙道越州；至道三年(997)属两浙路越州；宣和三年(1121)七月，改剡县为嵊县，仍属越州。”实际上，嵊州市文物管理处曾于2006年征集到一块《唐故高府君(文漱)墓志铭》，根据这块唐代砖墓志显示，唐咸通二年(861)初剡县已改称贍县，这比《嵊县志》(修订本)记载的908年，提前了47年。剡县改名贍县，当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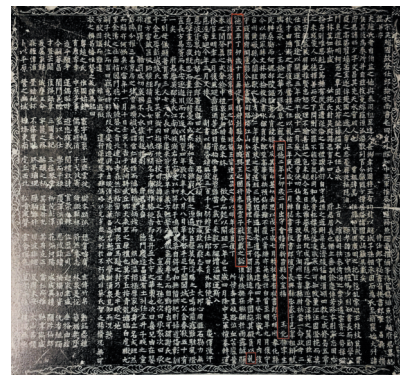
民国牛角雕柿子如意摆件



唐末裘南起义失败后不久，并非史书记载的五代吴越王钱穆时期。

而据此大宋吴越国赵府君墓志铭记载，墓主赵昭文于北宋乾德五年(967)任剡县令。此时贍县已复称剡县，隶属于吴越国所称之“会稽府”。这比《嵊县志》(修订本)记载的“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复称剡县”的时间提前了至少11年。考南宋《宝庆会稽续志》记载：“梁贞明中，(钱)穆既为吴越国王，遂以杭为西都，越州为东都。其后又以越为会稽府。”清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又云：“《会稽续志》八卷，梁国张璠撰，有宝庆元年三月自序。其提刑、提举、进士题名，皆前志所未有；而人物一门，亦多补前志之阙漏。吴越钱氏尝称越州为会稽府，前志不载，独见于此书，可见其留心掌故矣。”可知吴越国称越州为会稽府确有其事，墓志所言不误。此外，北宋开宝七年(974)，吴越国罗坦墓志题记“大吴越国浙江东道会稽府余姚县”字样，亦可佐证。

赵昭文曾任吴越国剡县令，地方志无载，可补嵊志职官志阙遗。同时，其墓志铭内容弥补了历代文献对嵊州县名变更记载的不足，证实贍县复称剡县的时间非在吴越国纳土归宋的太平兴国三年，而已提前至吴越国忠懿王钱俶执政时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大宋吴越国赵昭文墓志铭

□李喜庆

秋冬时节，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令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在藏品世界里，瓷器就像刚劲的山峰，片片枫叶似天上落下的云彩，飘落在雅致的瓷器上，美不胜收，也让人驻足观赏。

民国粉彩枫叶小碗(图一)。碗外壁的粉彩图案就是几片似火的枫叶，枫叶在几枝干枯枝条的陪衬下，显得娇艳欲滴，胜过二月的鲜花，仿佛有晶莹剔透的水珠在红叶上滚动，让红叶充满了生机。粉彩是清代对瓷器制造史的一大贡献，它是一种软彩，也是一种釉上彩，即在烧好的素器釉面上进行彩绘之后，再入窑进行低温烧制。粉彩出现在康熙后期，经过雍正时的发展，到乾隆年间已经达到极高的工艺水准。

吉州窑黑釉枫叶六边盘(图二)。盘内黑釉，釉色晶莹浑厚。盘底装饰一片黄色的枫叶，看上去就像一片轻盈枫叶被风吹落到盘里一样，非常逼真，树叶纹理清晰细腻，呈现出自然意趣和诗意盎然的艺术效果，令人叹为观止。黑釉瓷是吉州窑开放“异彩的山花”，又称之为“天目瓷”。瓷釉面呈黑色或黑褐色，通常分为一股黑釉与花色黑釉两大类，花色黑釉还可分为油滴、兔毫、玳瑁、麻酱釉等类型。

□赵畅

从“司母戊鼎”改名“后母戊鼎”说起

“后母戊”青铜方鼎是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当年的教材上它的名字是“司母戊鼎”或“司母戊方鼎”。一个“司”，一个“后”，看起来区别不大，前者似乎还更有“群众基础”，为什么一定要“较真”？对此，文物专家、考古学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员孙机先生严谨地解释说：“这个‘后’字，它是反文，就是反着写的。看起来可以念成‘司’，实际上只能作‘后’讲。”

93岁的考古学家孙机先生之所以如此较真，是因为在他看来，“文物研究是科学，做研究不是为了挣钱，就是为了做这门学问。”更何况，“司”与“后”其意义大相径庭，如若“司”“后”不分，以讹传讹，必因谬以千里而赔笑大方，成为千古笑柄。

正如孙机先生所言：“《说文解字》里说‘司’是普通职工，你想，一个普通职工，能给他做这么大一个

祭祀的鼎吗？1800多斤，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它绝对不是‘司’，一定是‘后’，因为‘后’是有地位、有身份的。”其较真、一丝不苟的态度，从中可见一斑。

把每一件文物搞懂、弄通、吃透，为何是重要的前提？这是因为每一件文物都是过往历史、文化、科学、工艺等诸多信息的有效载体，人们了解、积累知识和智慧，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剖析、了解文物而获得并完成的。既然如此，那么在鉴定文物过程中我们就必须抱着极端负责的态度，坚守工匠精神。否则，稍有差错，就有可能影响正确的判断和最终结论。

想起2014年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但在一锤定音之前，有国家提出异议，“他们说本国的丝绸比中国更早，但那用的是野蚕(柞蚕、

蓖麻蚕等)吐的丝，而不是家蚕(桑蚕)”。本来不是事的事，有了插曲还是要重视。中国国家文物局就此要求考古界拿出“丝绸起源于中国”的实物证据。其实，百年来的田野考古已获得多次实证，但方法主要是观察。如何在炭化、灰化、泥化、矿化的遗迹遗物中，找到丝绸的痕迹？我们便借助科技的力量，进行了“于无形处觅丝踪”的一系列追溯，最终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界证明丝绸起源于中国。

能否对文物鉴定做到较真、一丝不苟，反过来，也是对鉴定者自我道德、人品的鉴定。极个别鉴定者满脑满眼都装着金钱与物质，他们又怎么可能恪守职业道德和从业规范呢？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孙机先生身体力行于较真、一丝不苟，闪耀着思想的光辉、精神的光芒和人格的魅力，也无疑成为鉴赏界和博物馆系统一股潺潺不断的清流、一辆猎猎作响的标杆。

□彭宝珠

栩栩如生的翡翠蛭蛭白菜

白菜，古名菘，是最为普遍、最为家常、最为实惠，也是最受欢迎的一种蔬菜。因其寓意美好，自古以来就深受各类人士的喜爱，也是清代较为常见的玉雕题材之一。天津博物馆所藏的镇馆之宝清代翡翠蛭蛭白菜，是一件珍稀的俏色作品。这颗翡翠蛭蛭白菜的原料上有白、绿、黄三种颜色。白菜帮为白和灰黄相间的颜色，浅黄的菜叶翘起，上面茎脉分明，工匠们大胆地将原料上的黄褐色保留在菜帮上，以表现出白菜被霜冻后的质感，使其别有一番风味。工匠们还利用菜心处材质的翠绿色，圆雕出两只蛭蛭和一只螳螂，它们看上去似乎正在品尝着菜叶的美味。整颗白菜惟妙惟肖，生动传神，既素又雅。



清代翡翠蛭蛭白菜

这颗翡翠蛭蛭白菜在白菜原有寓意的基础上，加上了蛭蛭和螳螂。古时候，蛭蛭象征着种族的兴旺，生命的繁衍，多子多孙。螳螂是有益的昆虫，有勇武无畏的寓意。工匠们的巧思妙构使人惊叹不已，其卓越的技艺独具匠心，在清代玉雕中堪称冠绝。白菜叶清清爽白，叶很大，又有事业有成的寓意。此外，白菜还常被取谐音“百财”，视为招财之物，寓意财源滚滚。这颗翡翠蛭蛭白菜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翡翠工艺中的佳品，是清代玉雕技艺的见证，传扬了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简单朴素才是生活的真醇。

我在农村生活过，从小就爱吃白菜。秋冬季的大白菜，叶子像碧绿的翡翠，饱含汁液的菜帮晶莹洁白，像温润的和田白玉。看似普通不过的大白菜，却有着丰富的营养价值。中医认为，白菜其性微寒无毒，具有养胃生津、除烦解渴、利尿通便、清热解暑之功效。菜蔬里，白菜最素雅，清而溢远，淡而宜身。素雅的白菜，靠着它淡淡的味道、朴素的外表、平实的品质，让人们在秋冬季节里感受到一种温暖。

□胡胜盼

威武雄健石豹镇

席镇，是用来压席子四角的，是魏晋以前人们常用的生活用具。不同质地制作的席镇不仅实用，而且因各朝各代人们思想意识、审美追求的不同，而衍生出各种样式，在古代工艺美术中独树一帜。徐州博物馆藏有一件上世纪90年代出土于狮子山西汉楚王墓的石豹镇，别具风格。

石豹镇，长23.5厘米，宽13厘米，高14.5厘米。文物出土于狮子山西汉楚王墓西第1耳室，以青灰色大理石雕刻。豹和台座连为一体，侧卧于台座之上，双目圆睁，瞪眼前视。口微张，齿外露，双耳直竖，脸部周围有一圈鬃毛，脖颈上佩戴有华丽的嵌贝项圈，项圈上有用以系绳的钮。豹体肥硕，长尾从两后腿间反卷曲于背上，四足巧妙地分布在同一侧，少了野性，但显得雄健而又温驯。石豹镇采用圆雕技法，简洁凝练，概括而传神。该耳室还出土另外1件造型、大小同样的石豹镇，但豹体上有明显的残缺。同墓还出土2件造型颇为类似的铜豹镇。这些豹镇均为镇席用具。

汉代人的主要起居方式是席地而坐，为避免起身和落座时折卷席角，遂在其四隅置镇。席镇由此而来。席镇有虎、豹、辟邪、龙、羊、鹿、熊、龟、蛇等多种造型。汉代邹阳《酒赋》云：“安广坐，列雕屏。绀络为席，犀象为镇。”在我国汉代墓葬和遗址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镇，据不完全统计，经过科学调查发掘的汉代遗存中出土的镇达400余件。豹是西汉墓葬随葬品中常见的形象。西汉时期，王侯贵族有驯养豹的风气。徐州簸箕山宛朐侯刘孰墓为西汉早期墓，出土的人物画像镜背面的纹饰中有驯豹场景。驯豹者是一位身着汉装的男子，坐姿，左手前伸作抚摸豹首状。豹体形细长，身上有圆形花纹，前爪伏地，后体腾空。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为西汉前期墓，墓葬出土的大漆扁壶上绘有7只奔腾跳跃的豹子，颈部都带有项圈。山西朔县西汉墓中出土有式样与狮子山楚王墓石豹镇非常相似的铜豹镇。

出土器物上的驯豹图和豹脖颈上佩戴的项圈清楚地说明，我国在西汉早期就已驯养豹子，并且可能已经实现了本土驯豹。猎豹驯养最早始于印度孔雀王朝瓶沙王，时代相当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目前尚未发现西汉以前驯养豹子的实物资料。西汉时期，这些经过驯化的豹子当是用于协助狩猎的猎豹，它们具有飞快的奔跑速度和良好的捕猎能力，是狩猎时的得力助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王侯贵族狩猎风气的盛行。汉代以后较长时期内，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中都鲜见猎豹踪影。唐代开始，重见有关猎豹的文物资料。狩猎风气在大唐盛世极其盛行，猎豹的使用也相当普遍，从事猎豹驯服的侍仆中有不少是西域胡人。唐代以后，使用猎豹狩猎的做法一直持续至元明时期。



西汉楚王墓石豹镇